

老街的故事

毛勇强

宏伟的罗江自东向西流，秀丽的陵江自北向南流，在百足岭前汇合，形成了如诗如画的“两水萦回”的景观。化州市合江镇也因此而得名。据史料记载，唐朝初年，合江曾是陵罗县的县址，距今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。

今天合江镇的老街是否旧县址？前些年，市有关部门曾派员前来勘查，但未果。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老居民也不得而知。但是，从她固若金汤的古城墙、古色古香的城门口，还有那些摇摇欲坠的旧商铺，都可以证实老街确实有一定的年纪了。

老街长不足三百米，两侧的居民住宅是清一色低矮狭窄、几十米长的砖瓦房，人们习惯称为铺。屈指可数的几幢两层楼房都是单位的“专利”。老街的地面原来是青石板已不得而知。到我懂事时，是传统的灰砂筑成的，还在街道的中间位置，用碎瓷片“制作”了“一九五七年造”的字样。老街宽约六米，在没有汽车、摩托车和自行车的年代，我们不得不称赞古人有“超前意识”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第一春，我出生在古镇的老街。我家位于老街的黄金位置，每逢春节、年例和元宵等重大节日，戏台就设在我家门口，看电影时银幕也是挂在我家门口，看木偶戏、电影、大戏真是方便极了。
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“个体户”的名词还没有诞生。老街屈指可数的门市部统一姓“公”，还有财政所、粮所、银行营业所等必不可少的单位。老街的居民只有二十几户，有几户还是农业户口的。因此，整天在老街玩耍的我们，闭上眼睛也能找到任何单位或居民家，也能描绘出

老街的风情。

在我的孩提时代，文化生活十分贫乏。那时，公社没有电影队，而县的电影公司是巡回放映的，一般一个月只到圩上放一次电影，县的粤剧团难得得到圩上演出一次。因此，每到放电影或有剧团演出，大家兴高采烈，奔走相告。但是，不论什么年代，喜欢文体活动或者向往热闹是人们的本性，老街的居民自有娱乐的方式。晚饭后，一些民间艺人和发烧友自发组成“八音班”，从家里拿来板凳、小矮凳，有的带二胡，有的带笛子，有的带秦琴，在老街的最热闹处，摆开了阵势，吹拉弹唱，吸引了大批街坊邻里前来观看。每到高潮时，围观的人也会跟着哼几句，或者翩翩起舞，一派温馨和谐的氛围。

最为普遍的娱乐活动是，在自家的门口打扑克、下象棋，特别是象棋档真是热闹非凡，因为老街的男女老幼，会下象棋的大有人在。不论是在圩上唯一的理发铺，还是市场或者居民家门口，只要象棋档一开，参与的、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人声鼎沸。观棋不语是人生的一个高层次境界。但能做到的却不多，而且都是街坊邻里，朝见口晚见面，因此观棋语者大有其人，甚至动手拿棋子的也有之，于是更加热闹。有时，为了一步棋，一些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是司空见惯的事，不过大家都绝没有恶意，使我们这些小孩子觉得非常有意思。

北京人喜欢“侃大山”，而老街的人却喜欢聊天，这也成了老街的一大特色和“传统节日”。当时，由于在繁忙的劳作之余，人们没有什么好去处。于是，自然而然地聚在一起聊天，以打发时光。

夏秋季节，天气炎热，老街的居民在忙完家务之后，从家里搬来吱呀作响的椅子或者长凳，摆放在家门口，有的手拿葵扇，有的拿来水烟筒，个别“斯文”者捧着一杯水，聊天档口也就开张了。聊天的内容天南地北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。当然，谈得最多的是工作（生产）生活的事，也不乏拉家常，或者张家李家长短之类的事情。偶尔，也聊一些“儿童不宜”的事情。

老街朴实无华，民风淳朴。街坊邻里以诚相待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每家都会抽空前来帮忙。当时，大家“一穷二白”，但街坊之间互相帮忙，从来没有人考虑要报酬，全是“义务劳动”。我家的铺，是经祖父和我父亲购买的，到我读初中时，已破烂不堪，岌岌可危。我们全家节衣缩食，决心将房子拆旧建新。于是，需要预制一些水泥构件。由于实在太穷，预制构件也分多次进行，攒了一点钱，便预制一部分。这项工作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，比如扛水泥、搅浆等等，自家人的力量是不够的。因此，每次预制构件时，好几位街坊闻讯前来帮手，有时还挑灯夜战，到深夜才收工。但当母亲煮了白粥，请街坊吃时，他们往往婉言谢绝，使我们全家人感动无比！

老街兴做农历年例、元宵、清明、五月初五、七月十四、中秋节、重阳节、冬至、除夕、春节……每逢节日大人们忙碌，小孩子欢天喜地。不管多穷的人家，都杀鸡或杀鸭，大家一饱口福。至今难忘的是，各个农历节各具特色。例如，五月初五家家户户杀鸭，七月十四做簸箕炊，冬至包粽子等，内涵丰富，热闹

非凡。节日期间，妇女们自然而然成为“主力军”。一大早，她们就起床了，木屐声“嗒嗒嗒”，宁静的老街被她们唤醒了。不过，街坊邻里没有人有半点怨言。她们有的挑水，有的买肉，有的串门。现在，回想起来，每到节日，妇女们是十分辛苦的，起早摸黑，忙碌大半天，以致腰酸腿痛，但她们毫无怨言，乐此不疲，体现了传统女性不怕苦、不怕累的美德。

然而，后生哥、靓女们可不爱听老街的故事了。历史虽然是一笔宝贵财富，一面镜子，一部教材，但毕竟早已逝去，而且有的不堪回首，甚至是一种耻辱。所以，当有的人唠叨旧事时，年轻人便会抛出一句：都什么年代了？还提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。

改革开放写春秋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如今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在青少年眼里，老街已落伍了，对这条记录着历史沧桑的老街，老年人老土的生活方式，一些人慢条斯理的传统习惯，表露出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。老人们蓦然回首，老街的居民已卖掉祖屋，到县城、特区或者到省城安居乐业了。这些具有“树高万丈，落叶归根”观念的老居民对一些后生们的做法也不屑一顾：老街人地两熟，悠然自得，休闲方便有什么不好？

我生在老街，长在海街，对老街一往情深。我常常梦见老街，梦见老街的街坊邻里，梦见老街的点点滴滴，尤其是那淳朴的民风，与人为善的传统，互相关爱的美德。我想，一个古镇保留了这条老街，也就是保留了历史，保留了民族特色，保留了一部教材。不同的话，也许让今昔就失去了对比，没有了反差，也许让人们不无遗憾！

清贫砺韧： 从赤脚少年 到石化劳模

海煌

煤油灯映着补丁摺补丁的衣角，田埂上留下深浅不一的赤脚印——这是我年少时与清贫为伴的日常。没有优渥的起点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却在石化装置的轰鸣声中，把岁月赋予的磨砺淬炼成攻坚克难的韧性。数十年扎根岗位，从青涩学徒到技术标杆，从田间少年到行业劳模，那份在清贫中沉淀的坚守与执着，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。

1951年初，五岁的我永远失去了父亲。母亲三十八岁拉扯着六个孩子，大姐十六岁，小妹尚在襁褓，家里的天仿佛塌了。幸好年过六旬的外婆坐镇主心骨，母亲在大姐的帮衬下，硬是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，也让我从小直面清贫，筑牢了坚韧的人生底色。未及六岁，我便跟着二姐割草放牛、摸鱼捉虾，早早尝遍生活的艰辛。除了年节，白米饭是奢望，鱼更是遥不可及，我和大姐骨瘦如柴，1954年大姐险些在饥饿中夭折。但母亲常说“怨天尤人没用”，还总念叨“手脚勤快就有饭吃，读书能改命”，这份绝境中的叮嘱，让我坚定了奋斗的信念，也磨出了不服输的性子。

读小学时，我穿着打满补丁的衣裤，无论酷暑严冬、刮风下雨，始终打赤脚上学。秋末冬初的凌晨四点，我和二姐就得跟着社员去田间打泥坯，直到临近上学才匆匆往家赶。生活再苦，我从未想过放弃读书——1959年，我和姐姐双双考上茂名市一中，我当选语文学科代表，成绩始终名列前茅，在清贫中守住了对知识的渴望。

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，初冬便被派往高州水库工地务工。一日三餐管饱的日子，让瘦小的我练出了结实的身板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却更添了几分力量，也培养了吃苦耐劳的品格。1964年，我获评“茂名市四好青年”，这对我奋斗的第一份官方认可，也让我更加坚定了靠实干改变命运的方向。1966年，我加入高山土方队挖土方，每月除了回队款还有五元多收入，终于能贴补家里的盐油酱醋开销。我拼尽全力干活，生怕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，因而得到了副队长唐俊德的认可；同年九月，我有幸转为临时合同管道工，跟着师傅学时不敢有丝毫怠慢，提前备好工具，收工时整理好物料，六年里无差错、未被辞退，正式踏入石化行业。

1972年，我终于成为正式国企工人，次年便升任管工班长，迈出了职业管理的第一步。担任班长后，我每天下班都会把图纸带回家钻研，画出清晰的施工草图，让文化水平不高但手艺精湛的工友们干活事半功倍。1978年、1979年，我连续两年获评“茂名石油公司劳动模范”，技术与工作能力获得行业权威认可。但我并未止步于此，1979年作为学习积极分子赴大庆开会后，得知公司职工大学招生，我果断报名，考上预科班后又转入广东电大深造。四年求学路，我克服了年龄偏大、基础薄弱、家庭负担沉重的难题——每晚哄睡孩子后，我便在煤油灯下背公式、抄笔记，常常学到深夜，实在困倦了就用冷水洗把脸提神，凭着这股韧劲顺利拿到专科毕业证。

回到工作岗位，我将所学付诸实践：1984年一蒸馏大修，我将工艺管道按管号汇编成册，详细列明管径、焊口、配件等信息，大幅简化了施工流程；1990年茂水长输管道工程，我以总工程师身份负责技术指导，实现全线通球一次成功，从技术骨干成长为能扛起重任的核心力量。1995年出任安装三公司经理后，我发现工艺管道施工存在质量不稳、进度滞后的瓶颈，于是大刀阔斧推行改革：将3个管工班扩编至6个，撤换不求进取的老班长，选拔5名年轻有为的工人担任班长；利用晚间开设技术学习班，亲自授课；分批培训管工和铆工，课后组织严格考试。有位学员仅考4分，经查患有严重恐高症，公司决定予以辞退。他的表哥送来装着现金的信封求情，我当场退回，坚守用人原则。改革后，我们公司成为建设公司的排头兵，用实干与原则赢得了广泛认可。

任职期间，我很少待在办公室，工地便是我的主战场，遇到问题当场解决。1998年，我获评“茂名石化模范共产党员”，这份荣誉是对我数十年兢兢业业的最好回报，也让我愈发坚信：所有成就都藏在日复一日的坚持里。

如今回望过往，从1951年丧父后的风雨飘摇，到少年时赤脚求学的艰辛；从高州水库的工地磨砺，到石化行业；从学徒到技术的蜕变；从煤油灯下的苦读深耕，到技术攻坚与管理改革的担当，我从未依赖过运气，只靠“踏实”二字。现在的年轻人或许面临着不同的压力，但困境从来不是放弃的理由——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那些在清贫中磨出的韧性，那些在岗位上坚守的初心，终究会铺就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。只要肯奋斗、不放弃，日子总会越过越好。

倘若真有，那角落里应有一种气息——不是樟脑的陈旧味，而是夏日大椰树经阳光曝晒后，那股清冽的、生生不息的椰香。

我带上那张旧毕业照回去。照片上的少年，眼神清澈，对未来一无所知，却又仿佛无所畏惧。我想站在母校的新大门前，对那个十四岁的自己轻轻说：“你看，我们走过的路，没有一步是白费的；你听，这漫山遍野，都是回响。”

百年学府，于历史长河不过一瞬；四十三载春秋，于个人生命已是全部。母校是永恒的渡口，而我们，是那千万个撑篙人中的一个，将一代又一代的期盼，从此岸，渡往光明的彼岸。这，便是一颗砂砾对时代的全部告白。

四十三载如约，百年渡口

陈德文

摩挲着那张微微卷边的黑白毕业照，指尖触到的是1985年夏天廉江灼热的阳光。12月6日，我揣着这张照片，回到了那片阳光最初照耀的地方——我的母校广东省廉江师范，如今的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，赴一场百年的盛会。四十三载，恰如弹指一挥间。

我是1982年秋踏入校门的。那年我十四周岁，是我们初中班里考上师范三个人中的一个。离家那天，父亲默默地将其专门特做的一只木箱子递给我，里面除了衣物，还有一本崭新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绿皮火车吭吭哧哧，将我从未知载向另一个未知。那时的廉江师范，三幢高高的教学楼刚刚建好，地面上还显得有些杂乱。操场在一个岭顶上，四周是密密的树林。晨起跑操，空气里满是露水与泥土苏醒的气息；夜晚自习，头顶是老式吊扇晃动的光影，沙沙的翻书声汇成一片光知的潮汐。

最难忘的，是礼堂旁边那间小小的琴房。脚踏风琴的簧片有些老旧了，踏板需要格外用力，琴声便带了些哑哑的倔强。我们这些未来的“孩子王”，就在这哑哑的琴声里，笨拙地敲击琴键，让《我们的田野》和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的旋律，



一遍遍叩击年轻的心扉。那时我们并不完全懂得，这些简单的音符，日后将成为我们召唤另一个世界的号角。

三年，短得像一首歌的过门。1985年7月，我被分配到化州市一所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导主任。报到那日，雨后土路泥泞，我推着自行车，鞋上沾满了沉重的红泥。祠堂改成的教室，多数都是泥砖房，窗户没有玻璃，蒙着旧化肥袋。二三百个孩子，九个教师，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这些孩子眼睛亮亮，却藏着羞怯与茫然。我的第一堂课，就在漏雨的屋檐下，教他们唱那首在琴房里练习了无数遍的《我们的田野》。

最初的日子，是清苦与孤寂的。煤油灯下批改作业，鼻尖染上黑色烟炱；自己动手糊

墙、修桌椅，手掌磨出血泡。理想的光晕在现实的粗粝面前，曾一度黯淡如风中残烛。直到那个寒冷的冬日，一个总缩在角落、衣衫单薄的小男孩，悄悄将一只尚带体温的熟红薯塞进我手里，又飞快跑开。我捧着那只小小的红薯，站在破旧的走廊上，望着远处苍苍的山野，忽然泪如雨下。那一刻，我洞见了这份职业全部的秘密：它关乎知识，更关乎温度；它塑造灵魂，首先要点燃炭火。

往后的岁月，我便像一颗铆钉，将自己牢牢契入这片土地。我将唐诗编成山歌，带孩子们在田埂上诵读；用废弃的瓶罐做教具，讲解什么是“容积”；开辟学校旁边空地，带领孩子勤工俭学，培养孩子良好劳动习惯。我见证了他们中有

人第一次走出乡村，考入师范，又回到邻村任教；也平静地送别了许多背影，看他们汇入深圳东莞的打工潮，成为繁华都市里沉默的基石。我的青春，我的热血，就这样化作了他们作业本上的红勾，化作了毕业照上一张张愈发灿烂的笑脸。母校赋予我的，不过是一叶扁舟，一把旧桨；而命运让我摆渡的，却是一条何其壮阔的生命之河。

如今，我的母校已升格为湛江幼儿师范专科学校。当年的红砖白墙楼大多已被崭新的粘着瓷砖的教学楼取代，科学楼、音乐楼、舞蹈楼、体育馆也增加了好几幢，琴房已变成了钢琴楼，脚踏风琴也换成了光洁明亮的钢琴。据说，校史馆里会为我们这一届留出一角。

少年逸事

陈冲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自行车还是个稀罕物。土养的叔叔在公社供销社工作，配给他一辆“红棉”牌自行车。这可是全村唯一，也是土养常在伙伴面前炫耀的“资本”。

我和土养是邻居，其时正读高一。那是一个暑假的周末，土养的叔叔骑着自行车回家休假。为了达到借车的目的，土养在叔叔面前百般讨好，最后才说是想借车和我们一起探探附近的亲戚。其叔叔犹豫半天，还是勉强同意了。土养喜出望外，推着自行车到我家叫我和他外出玩玩。

我们身无分文，能到哪里玩呢？我想到了我姨妈，平日对我

很好，况且离我们不远，还有一条笔直平坦的土公路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土养载着我骑得飞快，时不时还哼上几句歌儿，那呼呼的风儿把我俩的衬衫下摆吹飞起来。不到30分钟，便到我姨妈家了。

姨妈姨父见了我俩的到来，很是高兴，又是杀鸡，又是到地里割菜，忙碌着为我们张罗晚饭。我们受宠若惊，这在当时算是贵宾级待遇了。

姨父是个蔑匠，平日除参加生产队的劳作外，业余时间便在家里编织竹器，诸如箩筐、畚箕之类。编织攒够了一担，便挑到附近的梅菜街出售，换点钱帮补家用。那天姨父刚好攒够了一

担，准备明早挑到梅菜街，现在看到我俩骑了这辆自行车来，便想借用这辆自行车帮个忙，图个轻松。我们坐在门前的竹荫下纳凉时，姨父试探着问我：“阿冲仔，究其实你们俩哪一个车技高些？”我实话实说：“我们在村中比试过了，土养的车技比我高。”土养低着头不好意思地笑，没说话。

这时，姨父吸了一口烟，吐着烟雾，悠然自得，满脸堆笑：“我计划这样：明早吃早饭，土养载上我和这批竹器到梅菜街。阿冲你留在家中，待我卖完竹器，从梅菜街顺买几味海鲜回来，晚上和你、土养好好喝一杯，庆祝庆祝。”

土养听了踌躇满志，第二天吃过早饭，早早推出自行车在门外等候。姨父笑眯眯从家里出来，想着今天不用挑担流汗，坐在自行车上悠悠悠乐陶陶便可到梅菜街了，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福呀，越想越开心。他把那搁在门外的箩筐畚箕一个个搁在车货架上，再用胶布绑紧扎牢，那动作欢快流畅得如同舞蹈。土养全神贯注扶着车把，两脚前后迈开扎着马步。我和姨妈从左右两侧扶着自行车，以防止跌倒。待姨父上车坐稳后，土养开始推动自行车，慢慢加快速度，本想像平日那样借助自行车前进的惯性一跃而上。但这次不知是货物装载过重还是过高，还

未等土养跨上自行车，便连人带车跌落到路旁的水田里了。姨父和土养同时栽倒在水田里，半身的泥巴。我和姨妈站在路上看着这一幕，不知如何是好，一边“哎呀呀”地叫，一边急急跑下田去拉起姨父和土养。姨父站起来，像哭又像笑，很是沮丧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看来，今天这碗‘自在饭’吃不成了，还是靠我这两个肩膀挑到梅菜街了。天生的牛命，注定是辛苦，没办法。”

我和土养闻言，面面相觑，既无奈又尴尬。

这件尘封的往事，已经过去60多年了。但每每想起，却总是忍不住笑。